

70年,上海电影的三次攀登

石川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电影篇

三大亮点

看上海电影与“城市品格”

海派电影作品的海派精神

上海的城市品格是开放、创新、包容,海派电影最显著的特点是艺术上的兼收并蓄、创作者的不断求索。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影遵循“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文艺创作准则,涌现出了一大批熔铸了家国情怀、人民性与人文景观的优秀作品。

70年电影征途,大师级电影人云集

回顾新中国电影70年,谢晋导演是座丰碑,他的作品饱蘸着对现实的关注、对社会的关切,在内容和思想层面,都触摸到了当代中国和国人的骨血肌理。吴贻弓导演激活了中国诗性现实主义的传统,在人文情怀的表达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上海的表演艺术家赵丹、白杨、张瑞芳、王丹凤、孙道临、秦怡等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

构筑电影工业高地

上海电影正在以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务实的态度,更加自信地通往未来之路,用更高质量、更多高峰品格的作品为中国电影从大国迈向强国作出更多的上海贡献。

登山是一项广受欢迎的人类极限运动。它的魅力在于,攀登者从不涉足坦途,而总是以超乎常人的勇气、毅力去挑战那些地势险要、环境恶劣的崇山峻岭。有时,他们不得不从幽深谷底,紧贴岩缝攀援而上,经过不懈努力,才能领略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巅峰体验。这种迂回起伏的攀登足迹,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上海电影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那些曾经或在为之奋斗的几代影人,也正是这样一群步履不停的攀登者。

70年来,上海电影有过三次从谷底登临巅峰的历史传奇。

▲电影《红色娘子军》由谢晋执导,祝希娟、王心刚等主演,获得第一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演员奖和最佳男配角奖



上海电影的“中国第一”

70年间,上海出品的电影成为我们生活的记录者、时代情绪的抒写者,以及未来梦想的刻录者。这些是上海电影创造的“中国第一”——

- ◆《魔术师的奇遇》——中国首部彩色宽银幕立体电影
- ◆《庐山恋》——创造“在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的世界纪录
- ◆《城南旧事》——改革开放后首部获国际电影节大奖的中国电影
- ◆《生死抉择》——有正式票房记录以来,首部票房过亿的影片
- ◆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新中国成立后的首部彩色戏曲艺术片

▲今年国庆档影片《攀登者》海报。该片讲述中国登山队向珠峰发起冲刺,完成了世界首次北坡登顶这一不可能的任务。演员阵容包括吴京、张译、章子怡、井柏然、胡歌、王景春、陈龙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上海影人以满腔热情为时代带来不一样的色彩

上海电影在70年里的第一次攀登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旧中国一路走来的上海影人,由于不熟悉新的文艺政策,对工农兵缺乏深入的了解和体验,在新的时代氛围中,一时有些无所适从。不仅影片产量出现下滑,部分创作人员也陷入了无片可拍的尴尬境地。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而言,如何帮助和促进这批老影人跟上时代步伐,尽快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激发他们新的艺术活力,便成为当时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1954年,上影接到生产指令,要拍摄一部表现渡江战役的军事影片《渡江侦察记》。厂里决定启用孙道临出演男一号——解放军侦察连连长一角。孙道临接到通知,心里犯了嘀咕:从没接触过解放军官兵的他,不熟悉部队生活,连怎么打枪都不知道,怎么演啊?后来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徐桑楚,当时是主管创作的艺术处处副处长。他找孙道临做工作,希望他把这部影片作为新的起点。为了帮助孙道临理解和把握角色,厂里联系华东军区原渡江部队,安排孙道临去体验生活。孙道临也不再犹豫,而是背起军挎,带上脚镣,跑到部队去“一、二、三、四”出兵操,与部队官兵共同生活了三个月。后来影片公映,银幕上孙道临饰演的侦察英雄李连长,不仅与角色毫无违和感,还在不经意间,为角色赋予了一份儒雅的气质,为新中国银幕奉献了一个风格独特的“儒将”形象。孙道临的成功转型,不仅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艺术道路,也为别的上海影人树立了榜样。一时间,转变思想,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积极投身工农兵影片创作,在老上海影人中蔚然成风。以前以出演年轻学生、小市民、知识分子著称的白杨,在《祝福》(1955)中成功塑造了劳动妇女祥林嫂的形象;擅长饰演交际花、姨太太、弱女子的上官云珠,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也为观众奉

献出《南岛风云》(1955)中游击队女护士符若华的光彩形象;一向以清丽雍容示人的秦怡,也凭借在《铁道游击队》(1956)、《林则徐》(1958)等影片中塑造了一系列纯朴、勇敢的农村妇女形象,为自身的演艺生涯实现了一次华丽的转身。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从旧社会走来的艺术家,并非只是消极地追随时代潮流,而是以满腔热情,力图这个时代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色彩。譬如赵丹,从上世纪30年代初入影坛,就怀着建构“中国表演体系”的远大抱负。到了1950年代,在“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时代氛围中,终于有机会在《李时珍》(1956)、《林则徐》(1958)等影片中,结合传统戏曲表演程式,经过大胆尝试,成功摸索出一套带有显著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质的表演方法。他利用古代士大夫峨冠博带、宽袍大袖的造型特点,借鉴戏曲舞台“上场风”和“紧打慢唱”的表演程式,将李时珍、林则徐这两位古代贤医,刻画得神采飞扬、入木三分,成为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在新老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上海电影开始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影片产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年产不到五部,迅速提高到1950年代末年产超过50部,为观众奉献了《铁道游击队》(1956)、《女篮5号》(1957)、《老兵新传》(1958)、《聂耳》(1959)、《红色娘子军》(1960)、《李双双》(1962)、《红楼梦》(越剧艺术片,1962)、《红日》(1963)、《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舞台姐妹》(1965)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形成了新中国上海电影创作的第一次高潮。

改革开放初期:

以源源不断的剧本供应,促成一部部经典名片相继在上影问世

上海电影第二次由谷底攀爬起跳,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十年内乱”让上海电影生产遭受重创,服装车间上万件戏服发霉破损,照明灯

具一通电源就会烧掉。唯一的家底,就是那些渴望重生的老中青三代影人。当时,全厂文艺六级以上且尚能从事创作的业务骨干正好一百零八人,被人称为“一百零八将”。可是,僧多粥少,剧本供应跟不上,再好的导演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这种形势,上影适时推出“老少结合、以老带新”的创作机制,让老导演与中青年导演“搭班开伙”,合作拍片。73岁的吴永刚与42岁的吴贻弓搭班拍了《巴山夜雨》(1980);75岁的黄佐临与42岁的傅敬恭一同拍了《陈毅市长》(1981);72岁的张骏祥与40岁的李歇浦联合执导了《大泽龙蛇》(1982)。正是这样的“搭班开伙”,在剧本短缺情况下,让原本无片可拍的中青年导演得到了上火线磨练的机会,为他们日后独立拍片创造了条件。

但这毕竟只是权宜之计,要保证生产计划的顺利开展,首要条件依然是充足的剧本供应。时任上影厂厂长的徐桑楚认为,剧本是为人才服务的。没有剧本,大家无片可拍,就谈不上人才。反过来,不是人才,也只有剧本投拍后才能得到检验。为了保证剧本供应,上影文学部50余位编辑被分为四个组,前

两组以长江为界,分成江南组和江北组。另外两个组,一个上海本地组,一个部队组。文学部的编辑,按照各自划片分工,分别联系相应地区的知名作家和创作机构。安徽著名作家鲁彦周曾说,上影厂的编辑,嗅觉比别人灵敏,只要一听到安徽省作协开会的消息,就会立刻跑来“蹭会”。实际上是想利用作家集中开会的机会,打探、搜集创作信息。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种“分片包干”的办法,几乎把东南西北各地作家“一网打尽”。从内蒙古的玛拉沁夫,到河南的李准;从广州军区的梁信,到海军政治部的叶楠,各路名家名作,纷纷被上影纳入囊中,一部接一部的经典名片,相继在上影宣告问世。

不过,有时候也会碰到兄弟厂之间围绕剧本所展开的激烈竞争。济南军区作家李存葆,因为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而名声大噪,引来全国各地制片厂的文学编辑,把军区政治部的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上影编辑是位女士,眼看在竞争中就要处于劣势,徐桑楚便在电话中对她大声喊话:只要他们愿意把《高山下的花环》交给上影,我们就请谢晋导演出来拍这部片子。果然,“谢晋”两个字成了剧本争夺战

中最有效的秘密武器。最终,《高山下的花环》于1984年由上影完成了改编拍摄。这件事让晚年的徐桑楚感慨良多。他说,就因为上影导演更有实力,我们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由于组织措施得力,短短数年中,上影的生产潜力再一次被挖掘出来。影片产量从1977年的年产四部,到1983年迅速恢复到年产20部。高峰时段,仅上影一厂就能有16个剧组同时开机。1982年就是这样的“丰年”之一。年初一部《牧马人》,岁尾一部《城南旧事》,妥妥地几乎囊括这一年全国所有的重要电影奖项,被上影人骄傲地称为“红烧头尾”。

新时代:

全国优势电影资源在上海形成新的集群效益

时光流转30年。当前,上海电影再次处于一个奋力登高的攀升期。上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

▲《城南旧事》像一首散文诗,通过沈洁饰演的英子,让许多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夏天的风、田间的路、小伙伴的老脚丫。



▲1980年上映的《庐山恋》中,演员张瑜总共换了43套衣服,为了拥有一件“同款”,许多女性观众不止一次走进影院,不少裁缝也通过电影开始了“时装”生意。



▲《城南旧事》像一首散文诗,通过沈洁饰演的英子,让许多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夏天的风、田间的路、小伙伴的老脚丫。